

著譯

系統理論與美國社會工作

— 譯如圭陳 —

作者發覺今日社會工作者仍依照傳統方式評估其案主，然而在干預過程上則採折衷模式，將醫療模式加以擴充，包含「人在情境中」的探究，並且應用各種理論。此處我們回顧三個主要的系統理論。

本文譯自 Social Casework, Vol. 66, No. 8, 1985 (Oct)。作者為 Genevieve De Hoyos and Claigh Jensen。原文發表於利諾市社會服務教育人員協會 (1982, 內華達州)。

一、前言

近年來，美國社會工作教育界十分流行「系統」(System) 概念。有關於「新理論的探究法」的文章與書籍相繼出版。當我們回顧相關文獻時，卻發現系統探究法並不完全是新的，三種系統探究法 (Three Systemic Approaches) 同時被倡導，而各種探究法的重點均在「系統」之概念。系統探究促使社會工作者觀察案主本身以外的社會系統，致力於將醫療模式轉變為社會學模式，其重點由個人轉向強調其社會系統。三個探究法各有其哲學根源，基於不同的假定，觀察不同之社會現象。為了辨識這三種探究法，作者回顧社會工作發展歷史，以三種探究法對於工作者的實際價值為基礎，評估這些探究法。

二、科學家和社會工作者

科學家尋求真理。換言之，科學家發展及考驗理論，以了解理論是否能解釋並預測現象。此外，以其發現結果提供專業人員的應用，如社會工作人員。

社會工作者則被期待選擇一種或數種探究法，運用這些方法處理案主的問題。舉例來說，精神科社會工作者採用斯金納 (B. F. Skinner) 的理論，強調行為修正。而美國的社會工作雖起源於應用社會學，但發展過程中卻失去了與社會學的連繫，最近才又恢復對於社會學的興趣。

十九世紀，美國的社會學者非常信任科學方法，甚至認為社會科學可以「解救」人類，這種現象在芝加哥特別明顯，他們致力於研究工業化及歐洲移民所造成的許多問題，並且支持亞當斯 (Jane Adams) 等對人們直接的影響。而亞當斯在協助案主了解制度；幫助案主克服社會生活難題；鼓勵、遊說及促成改變立法政策的時候，她被視為一名「應用社會學者」。

但是，一九二〇至三〇年間，社會學者不再聲稱他們了解社會事務，也不再直接涉及社會問題的解決。他們的退出所持理由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證明」社會科學無法應對社會問題，「經濟大恐慌」(The Great Depression) 再次肯定這個事實。直至今日，社會學者以其同樣為對象，分享理論及研究報告，而較少提供專業人員實務工作的基礎。

當三分之一的美國勞動人口遭解雇，轉而向政府尋求協助時，社會工作失去了案主。有部分的社

會工作者受政府雇用，一九三〇年許多機構的經費耗竭，社會工作也發現他們沒有一個「顧客」。幸好美國社會工作的生命力足夠堅強，他們開始採用新的理論，發掘新的案主以求生存。他們以佛洛伊德 (Freud) 的理論解釋中產階級勞工個別適應的問題，以人格及早期家庭經驗為協助重點，取代了貧窮的案主。當大部分工作人員不再為不幸者服務；不再涉及社會行動；也不依賴社會學的概念和解釋時，社會工作擺脫「應用社會學者」的角色，成為個案工作者。團體工作人員從徙置活動中心 (Settlement House) 轉向精神科治療領域。社區組織者與個案工作者聯結，由商業菁英資助私人機構的助人服務。

然而仍存在一些問題。佛洛伊德學派的探究法不符合科學，而被心理學者和社會心理學者排斥（尤其是學習論心理學者；象徵互動論社會心理學者）。事實上，這個問題不需視為真正的缺點。首先社會工作者可以發覺佛洛伊德學派理論的運用價值，對案主十分適用；其次由於精神科醫師和心理分析師致力於「新佛洛伊德學派」理論的發展，提供了社會工作者充實的新理論。

新佛洛伊德學派理論適用於社會工作領域。今日美國社會工作者間的不滿只是反應對貧窮作戰 (War on Poverty)，顯示需要更一般化的理論，以包括內在心理問題及不幸者社會調適的問題。

社會工作人員雖然成功的處理中產階級的案主，

但專業社會工作從未公然地放棄對不幸者的服務。事實上，自羅斯福總統推行「新政」(New Deal) 以後，社會工作專業包括兩種類型：(1) 具備社會工作碩士資格的專業人員，專門處理中產階級的心理問題；(2) 大學畢業的社工員，在政府福利部門對不幸者提供直接及間接服務 (通常由社會工作碩士督導)。

一九六〇年代不幸者的暴動和對貧窮作戰，導致社會工作革命。開始時，革命緩慢進行，致力於發展院外計劃。此後，社會組織者對社會學模型感到興趣，並在社會工作文獻中引用。個案工作也攻擊醫療模型無法認知個人問題乃起源於社會環境。系統探究法掌握教育者和實務工作的心像。致使社會工作的興趣從內在心理現象轉移到系統間的現象；由醫療模型轉變為個人在情境中 (The person-in-situation) 的概念；並且從直接個別的服務發展為直接與間接的聯合服務。

系統探究法以此廣泛的新焦點為理想基礎。無論如何，目前有關系統分析的文獻中，可以清楚的看出美國社會工作者的系統探究法並非一個，而是有三種不同的理論派別。

三、三種系統理論

一九六〇年起，系統模型流行於社會工作文獻

之中，作者普遍同意下列概念：

1. 案主不應被視為孤立、自足的存在，而應是互相依賴的系統，在複雜的大系統中互動，視個人情境、環境中；

2. 傳統的焦點應自醫療模型轉變為社會學模型，從個別系統到社會系統，並且從直接服務到間接服務。

然而，至今美國社會工作者仍不了解系統理論存在多於一個的派別，而將不同的派別視作同一主張。

最近四年，西波倫 (Max Siporin) 從生態系統理論中區分出一般系統理論。力摩門 (Jerome H. Zimmerman) 和羅德 (Gary A. Lloyd) 從一般系統區別生態透視；並且由社會系統理論抽離一般系統理論。

以下概述三種探究法。

(一) 一般系統探究法

赫頓 (Gordon Hearn) 於一九六〇年代，將一般系統理論引進美國社會工作，受到伯特倫非 (Ludwig von Bertalanffy) 的影響，赫頓視個體為一系統——定義為在一界限內相互關聯的各個部分「有目的」之組織體。系統中的訊息、能量及其他資源不斷的與環境互換。當個體接受輸入的訊

息和能量，會造成系統的不平衡，處理這些輸入則產生正向或負向反應。正向的反應指系統改變成經營新的形式或結構。負向反應則指企圖維持系統的現狀以保持平衡，是缺乏成長的狀況。

伯克利 (Walter Buckley) 特別指出阻礙變遷是一種病態，終將導致系統的混亂和死亡。

因此，一般系統支持者認為系統應被視為在較大系統內的運作，在互動中溝通、改變和成長。而這些系統可以是個人、家庭、團體、組織，甚至是國家。

(一) 生態探究法

生態理論源於社會達爾文主義、帕克 (Robert E. Park) 的人類生態學及列溫 (Kurt Lewin) 的場域理論，並由格曼 (Carel B. Germain) 引進社會工作領域。生態探究法不同於一般系統理論以改變的能力為重點；相反的，它強調個體與社會環境的妥協、溝通，以達到調適及生存。

生態探究視個體包含於與週遭環境系統持續的關係之中。它不同於傳統醫療模式著重在心理及順向、治療的層面，而強調相互作用及逆向、預防的探究。格曼和吉特曼 (Alex Gitterman) 也認為個人的不快樂，乃由於社會秩序下未解決的問題所引起。此結論有助於人們適應環境，因為當人們與其環境 (生態系統) 不能相互調適，則造成單方

或雙方的損害。當個體面對發展、地位變遷及危機，或社會、物質環境的壓力，他們努力地維持生態系統內某種程度的平衡，此時需要環境而非內在心理的干預。例如，格曼和吉特曼討論一位偏執狂女子的治療計劃，是以協助她與他人或新環境適當的互動取代精神治療，減輕其偏執症狀。

(二) 派深思模型

派深思 (Talcott Parsons) 是了不起的社會學理論家，他影響無數的哈佛學生及社會學者。但是一般引述他的理論模型者多半失去其精義。六十年代該模型會遭駁斥，而後派深思的貢獻再次為社會學界廣泛接納。

派深思的大名會出現於系統探究法文章之中，並為社會工作者熟悉。然而，許多使用派深思模型的作者忽略了主要理論，而只是採用 AGIL 模型 (即適應adaptation·目標達成goal achievement；整合integration·潛勢latency)，以分析、評估社會機構和制度的設立。

繼傳統歐洲社會學者之後，派深思發展了一套重要的理論，以解釋巨型社會體系。他自承受惠於韋伯 (Max Weber)，在一般行動理論中，他視人類為理性、快樂和充滿價值的；帕瑞特 (Vilfredo Pareto) 認為社會在「移向均衡」的狀態下，為目標一致取向的系統；及涂爾幹 (Emile

Durkheim) 一再肯定價值乃社會建立及維持某種程度秩序的主要因素，派深思以這些概念支持其理論架構。

派深思認為不同類型的個體可以發揮整合的功能，以維持某種社會規則的運作。此乃由於個體經由社會化接受共享的基本價值體系，而社會秩序即以此基本價值為基礎，因此個人會依據他所接受的社會報酬，例如地位、權威、金錢和愛的期望而行為。

因此，一男孩若將多數社會團體的主要價值及角色期望內化，則他在學校及生活中會表現良好，他將是好丈夫、好父親和社區中的好公民，以符合其取得之社會報酬角色。換言之，個人努力順從社會要求而獲得報酬，則個人將表現功能良好，並將該價值社會化。然而，如果該男孩認為環境對他無所助益，或是無法回報其順從的努力，則他可能進入偏差行為的循環。而偏差行為可能導致社會結構的變遷、犯罪、革命等個人及社會破壞的結果。

社會工作者擴充基本理論的探究，他們發現許多派深思的模型可用於協助案主解決社會問題。舉例而言，派深思假設兩個基本模型以處理貧窮、跨文化誤解及少數民族之間的社會文化斷層問題。(1) 價值取向的模型，提示使人們行為為基本不同的價值基礎；(2) 提供個人制約條件的報酬角色的社會模型，是社會控制的有力資源。

而離婚、老人問題、變遷中性別角色、工作角色、青少年犯罪矯治及由於困擾孤獨等感覺所造成的社會問題，也可由另外兩個模型加以解釋：(1)偏差行為理論，視偏差行為乃由於對社會提供之有條件報酬角色失敗所引起；(2)社會變遷理論，解釋社會變遷乃由於報酬的重新分配而造成的緊張，克服方法的革新、新結構，甚至新的價值等現象。

簡言之，專業社會工作人員應明瞭三個系統理論的存在。一般系統理論強調各種層面（個人、小團體或社會）系統變遷，視變遷乃反應外在訊息，以產生新的生存方法。生態系統理論視個別體系為大的生態系統中的一部分，為了達到順應、調適和生存，它必須具備協調交涉的能力。派深思想派模型則指明人類調適於組織與社會體系，更強調下列兩點：

1. 貧窮、差別待遇及錯置——為婦女、貧民及少數貧窮者所遭遇的問題；
2. 就業、性別歧視、青少年的不穩定及偏差行為或破碎家庭等社會問題——為全人類所面臨的問題。

四、社會工作系統探究法

我們整理「社會工作教育(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Social Work)」，「社會個案工作

(Social Casework)」，「社會工作(Social Work)」三份刊物過去十年中出版的文章，以推論實務工作者及教育者對於三種基本系統理論的反應。

大部分提及系統理論、系統、個人在環境中等概念的文章出現在「社會工作教育」，其次為「社會個案工作」，再其次為「社會工作」。同時，分析結果如下：

1. 關於實務工作的報告佔優勢
僅有三篇文章直接談及理論。其一提出派深思想學派的模型；其二討論一般系統較佳之觀點；其三論及一般系統理論，實質上則在提倡生態探究法。作者回顧這些文章發現大部分研究者談論系統理論時，只是為了改進實務工作或是教學、研究之用。
2. 著重社會工作的擴張
大部分作者希望擴展社會工作的焦點，而不支持任何一個系統理論。因此，只有四篇文章提到生態探究法的運用。十篇文章是沒有任何理論的探究，只是提倡涵蓋更多社會學的理论、案主的支持系統，或個人在情境中的觀點。

大部分社會工作者的興趣在於發現新的途徑以擴充醫療模式，包含案主的社會環境，而非對於特殊理論的詭辯。

3. 一般系統理論不再流行
一般系統理論為多數作者忽視，即使論及也多

為批評意見。一篇報告中兩位一般系統理論學者甚至指出：繼續討論這個主題似乎是不必要的。

西波倫 (Siporin) 對於這些評論加上一註解：「系統理論會有一段全盛時期，在部分社會工作學校中受到熱烈的接納，成為神奇的象徵。一時間，一般系統理論被視為社會工作唯一的理論。」但是，如今生態系統理論已取代了這種地位。

作者以此小型的研究為基礎，提出下列嘗試性的結論。

五、實務工作者的系統理論

自「對貧窮作戰」以來，實務工作者同意社會工作必須擴充其探究範圍，包括大系統的互動。因此，他們觀察並參與有關這主題的討論。然而，他們顯然並不重視派深思想模型，也不使用一般系統理論，而接納生態探究法。採折衷主義，在實務上使用更多社會學模型，而不專屬於某一理論派別。

除 AGIL 模型之外，派深思想並未完全為臨床或精神病社會工作運用。派深思想模型完全的提出，將有助於提供婦女、貧民、貧窮的少數團體等社會問題解決的新途徑，同時可以為全民服務。

而治療者最初排斥一般系統理論，乃由於它不適合社會工作的思考方式。當社會工作理論學者修正一般系統模型以反應社會工作的觀點，它變得不再

清楚。下面的例子可窺其梗概：

1. 當實務工作者不採納「變遷」為優於「拒絕變遷」之關鍵概念，若忽略這基本的預設，而將此基本觀念去除時，此理論變得無害也無益。

2. 當一些作者發現一般系統僅解釋變遷而不注重系統的性質及功能運作，只是從其他理論借用模型以擴充其系統。無論如何，違背一個理論的完整性造成模型的混淆，此模型將無法整合為一整體。

3. 雖然許多人嘗試使理論滿足工作者的期待。然而這順應實務工作者的理論，仍然需要實務工作者改變工作方式。而根據這些理論，教育者創造各種治療計劃，促使工作者成為「邊際工作人員」(Boundary Workers)，視案主為一系統，協助其調整、修正、持續反應自外界接收之訊息。大多數實務工作者仍然認為這些理論過於複雜。

以列溫(Lewin)的場域理論(Field Theory)為基礎，生態探究法對人類適應環境的解釋相當複雜。但是當治療者了解工作的重點在於案主與家庭團體、工作、友誼團體或宗教團體的調適，則工作者可以毫無困難的將焦點從案主直接的家庭調適，擴充到其他團體。

此後，哈特門(Ann Hartman)的生態圖(Eco-map)及其他模型相繼出現於社會工作文獻，並且廣受採納，社會工作者發現這些模型的適用與有效，他們可以運作一部分系統，而無需改變其工

作方式。

持平而論，目前傳統的社會工作者仍運用傳統的方式評估其案主。即使他們已體認系統干預的必要，甚至可取代內在心理的干預，但也只是擴大了思考範圍，擴及案主的環境系統。因此，採取系統模型而不涉及該模型立基之理論，似乎是實際解決問題的方法。

然而，這樣的方式並不能滿足多數的教育者。

六、教育者的系統理論

對貧窮作戰之後，社會工作教育者選擇系統探究法擴充對案主的服務。當時這個探究法相當樂觀。格曼和哈特門視系統理論為「能思考關於無法想像的」一種途徑。珍契爾(Janchill)則視系統探究不僅是心理分析與社會科學理論的橋樑，同時也提供個人於情境中的評估途徑。這裡產生一理念，即一般系統理論和生態系統理論可以組成成聚合理論(Metatheories)——以解釋案主為一個體；為親密團體的成員；或同時是社會成員。

如果社會工作能够發展聚合理論以解釋三個層次的行為，則他們可以成為更有效的治療者，並將整合上世紀Jane Adams及其同儕的社區工作和一九三〇年新佛洛依德學派(Neo-Freudians)的個案工作。隨時準備解決任何人類所遭遇的適應

問題。

發展一個這樣的理論是美國社會工作教育者的夢想。但是，社會學家聲稱聚合理論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只是理論的化約主義。換言之，社會科學家堅持在複雜組織中，個體的社會行為不能够以心理分析的觀點來解釋。他們主張個別行為必須個別因素觀點解釋，而相同的社會行為則應以社會因素的觀點說明。否則將是「混合胡蘿蔔與橘子」——理論與觀念之化約。

然而聚合理論的夢想一度幾乎實現。伯克利(Buckley)和伯特倫非主張，一般系統理論可以解釋每一系統在任何層次上的變遷。但是，事實上它是解釋了變遷的過程，而無法說明社會工作者所欲了解的：人類系統在不同層面的性質和功能。

這個夢想仍不應放棄。一個人類行為的聚合理論，並不比調適或組合社會學及心理學理論更可能存在。但是，社會工作者經由派深思或其他社會學模型，繼續擴充折衷的探究法來涵蓋社會文化的重要性。只要這些探究法的基本預設是以系統為本質，並且共存，則治療者能够處理三個層次的抽象概念而不必化約理論。

美國社會工作再度面臨抉擇，他們期待夢想實現。對於理論的興趣將更新鮮，並擴充工作的範疇，恰如案主的需要——整個人在整體情境之中(All People in All Situation)。